



烈士之血凝成的红色家风

家风是人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则族风好、民风好、国风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和倡导的向上、向好、向善的家庭风气，让家庭成为涵养美德、陶冶情操的“心灵归宿”。

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多年来一直与许多革命烈士家属、后代保持着长期联系，据馆方负责人介绍，革命烈士家属和后代的身分带给他们定其家、正其身的红色家风，让他们始终牢记清白做人、专心做事。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工作着，在潜移默化间带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本报记者 卫中

我们家认准了跟着党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现年75岁的顾正义是“公交三烈士”之一的顾伯康的儿子，谈及烈士后代这个身份对他的影响，他说：“父亲虽然牺牲，但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

顾伯康烈士牺牲前是上海公交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1949年初，上海公交职工开展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而顾伯康所在的枫林桥营业所是当时斗争的第一线。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锐利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国民党当局对上海公交职工开展的斗争行为非常恼火，顾伯康面临的危险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在离开家乡回到上海继续开展斗争前，对妻子说：“我们公交工人最近与反动派的斗争很激烈，听说解放军就要解放上海，天就要亮了。我这次回去，可能有杀头坐牢的危险，一旦不幸，你带好孩子，好好度日，如不行，可以改嫁。”妻子听他这样说，苦苦哀求他不要走，顾伯康只好谎称回公司取铺盖行李，谁知一别竟成永诀。1949年2月17日，顾伯康与其他参与行动的同事被杀害于江湾刑场。

当时的顾正义只有6岁，正是懵懂无知的年龄，父亲的离去给家庭带来的变故和影响，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知道的。让他最为敬佩的是母亲，父亲牺牲时母亲只有29岁，但为了抚养好自己，终其一生母亲也没有改嫁。年幼的顾正义已经开始从母亲身上感受到一种作为烈士家属的独特骄傲。小时候，母亲经常对他说：“是共产党造就了你，你长大后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可以说，最初的作为烈士家属的家风就是从顾正义的母亲开始形成的。

读大学的时候，顾正义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从25岁大学毕业一直到65岁退休，从祖国的大西北山区，到后来回到上海，顾正义面对每一个病人，都尽心尽力为他们治疗。他说：“医术是一种仁术，虽然不用像父亲那样牺牲生命，但我的医术是党给的，是继承了父亲的革命遗志，我必须兢兢业业当一名好医生，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作为革命烈士家后代的红色家风，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顾正义始终严于律己。他不无自豪地表示：“我现在退休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行医几十年，没有收过任何好处。这是我作为烈士子弟对父亲的革命精神的坚持，也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操守。”

顾正义家庭的红色家风，也传递到了下一代人，他的儿子留学日本后也放弃留在国外的机会，回来为国效力。顾正义要求下一代、下下一代永远记住，世世代代继承烈士遗志，他反复说：“我们作为烈士子弟没有为党和国家作什么贡献，只是个平凡的家庭，但认准了一直跟着党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理。”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父亲的血、母亲的泪

上海市革命老战士后代联谊会浦东分会副会长沈平的外公，是领导了著名的泥城暴动的沈千祥。沈千祥1928年6月在上海法学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受党的委派秘密回乡组建中共南汇县委，同时在泥城地区，以泥城小学校长的身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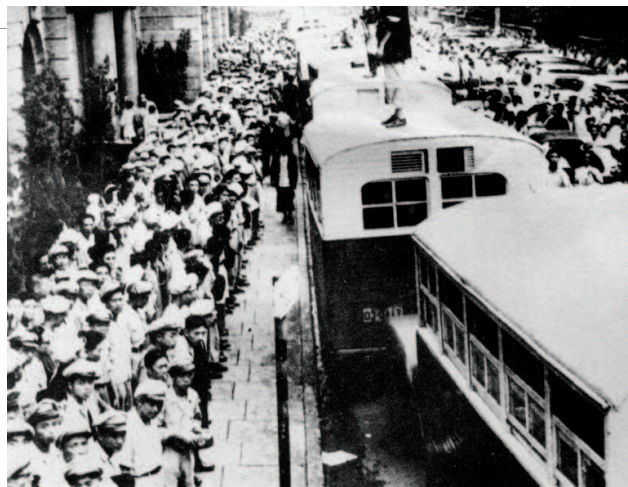
1930年8月沈千祥领导泥城暴动，在火红的浦东泥城大地上第一次升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暴动失败后，沈千祥任中共松江特委巡视员、松江县委书记，1930年12月在松江亭林被捕，1931年2月在江苏省松江被害。

在沈千祥牺牲前，已经把革命的血脉融入了这个家庭。沈千祥的儿子沈肖方在抗战时期，带领游击队开展长期的敌后斗争。女儿沈佩芳抗战后期参加革命，1947年3月8日入党。由于当时的入党介绍人后来牺牲了，资料遗失无法证明，只能按照1952年重新入党的时间计算党龄。沈佩芳考虑到有很多老首长、老同志可以为自己作证，就和哥哥沈肖方商量，打算和组织上申请把自己的入党时间改到1947年，结果被哥哥沈肖方批评了一顿，说：“为革命工作做了一点小事，就伸手向党和组织要这要那！今后这事不要说了，想想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父亲的血、母亲的泪，你会想通的。”

沈平说：“当年的革命战地，现已成为开发开放的热土，我虽然没能赶上跟随中国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个年代，但有责任一定要努力记录下那些革命先辈激情燃烧的岁月。”牢记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的理念，已经深深融入沈平的家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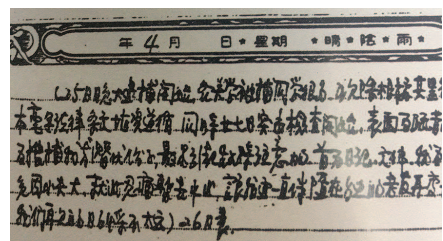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千千万万家庭培养传承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良好风气。杨杰的祖父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他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党组织安排去日本，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教育理论作出杰出贡献。1931年，杨贤江在日本逝世。”

作为一个革命烈士后代，杨杰从小就接受父母告诫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是烈士后代。杨杰当过工人、做过公司职员，现在从事统计方面的工作，一路上走来主要靠自己，单位领导及周围人都不知道他是烈士的后代，他也没有靠烈士后代的身份向党组织索取过什么好处。“我们本来就是普通人，是老百姓。只有认认真真做事、做人才是本分，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杨杰说。



钱相摩日记

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外景 (本报记者 叶辰亮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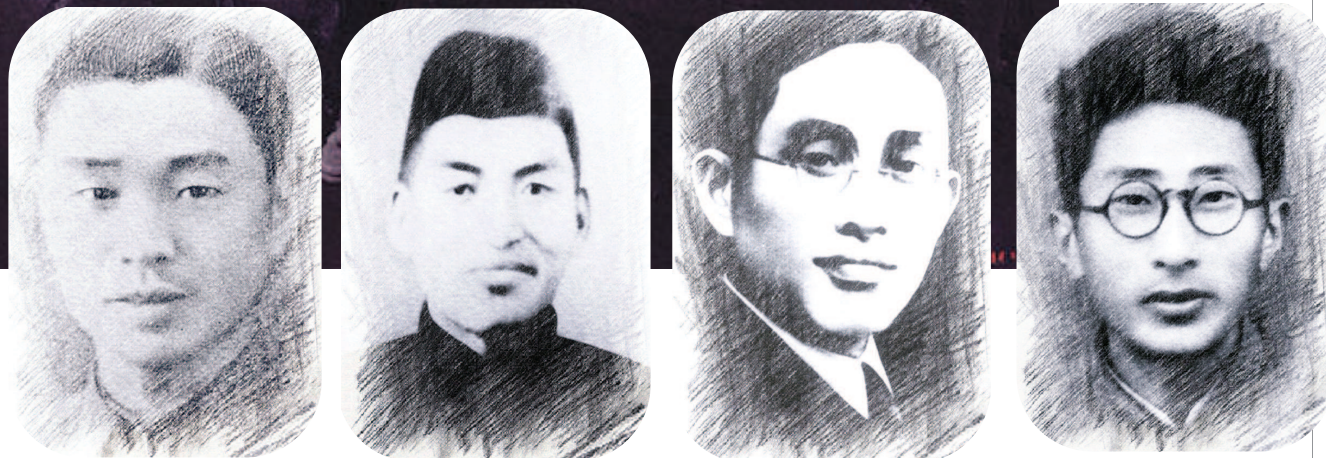


上海公交公司工人与国民党当局开展斗争
1921年，杨贤江被商务印书馆聘为《学生杂志》主编，任职六年



李前油画《真理之路——龙华烈士陵园园中的烈士》

从左至右分别为顾伯康、沈千祥、杨贤江、钱相摩，均为龙华烈士（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供图）



父亲牺牲时我才五岁，日记是我与他跨越时空的唯一对话

钱一呈

我父亲钱相摩烈士牺牲已经69年了，他生前写下的五十多万字的日记，是他留给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日记真实地记述了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一名普通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翔实记载了他为党的事业战斗的日日夜夜，尽忠尽瘁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奋斗不息，直至献身革命的壮丽人生。

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在敌人的营垒中，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始终是贯穿在父亲日记中的一条主线。

1948年10月20日是他入党一周年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刚一年，为我新生命的诞辰，我带着庄严而又欢快的情绪来庆祝我的生日，我要以力量、忠心，当作礼物送给党和母亲，表达我天真的谢意。”（“党”在这儿代表党组织负责人，“母亲”指党，“新生命”指入党）。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写道：“胜利愈来愈近了，内心的幸福简直无法描绘，像一个离开母亲已久的孩子骤然听到近处母亲说话声音似的，既熟悉又亲热，眼巴巴希望马上就能看到母

亲。同时我也感到愧赧，我的学业不够长进，没有好的成绩来安慰母亲。”“我仍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她忠于母亲以及母亲的教训，期间虽经过千变万化，百般的引诱，她只有比过去更坚定、更忠贞。”父亲对党的那份真挚的赤子之情，仿佛有透纸之力，流露在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使人难忘。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父亲孤身一人战斗在敌后，身边没有组织和领导，也没有任何亲人。只有一个政治交通员来往于他和苏北之间，传递着指示、经费和情报，有时形势一紧，会很长时间没有音讯。艰险的环境、紧张孤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父亲的意志。对此，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尽管生活过得艰苦，环境予我寂寞，根本都不值得考虑，乃至畏难而退缩。”“艰苦带来了考验，尽管上级党组织没有任何指示（迎接新形势新胜利）与经济上的津贴，我绝不怨天尤人。”“不苟且偷生……站稳人民立场，作出全部事业的新决定。”

由于“没有好的环境，适当的营养调适”，以至父亲“高度寒热将近一周……食量亦锐减，面色格外苍白，其他的血痔、肾囊风……百病俱发，住院诊治非我敢问津，即普通治疗，亦惘惘然而却步。”每当看到父亲在日记中写到的病况，常常使我潸然泪下。尽管如此，他在日记中写道：“仍不敢后退，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的职责。”“每当想到前途的昭示的时候，我又悄悄地在梦中笑了”。他以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与疾病和困苦作斗争，顽强而坚韧地战斗着。

父亲把日记视为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加强自身修养的“一面镜子”，是可以倾心交流的“老友”，不论环境多么险恶，他始终坚持不懈，从未中断。

1949年4月底，上海解放在即，而敌人的疯狂也达到顶峰。父亲一方面怀着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激动，但也深知当时形势的空前严峻，日记如果被敌人得到，也许会根据蛛丝马迹的线索牵连到其他同志。4月26日早晨，我父亲写下了他被捕牺牲前的最后一篇日记：“25日晚大逮捕开始，各大学被捕同学很多，现除根据黑名单外，根本毫无法律条文堪资遵循。同时27日突击检查开始，表面为疏散居民，实则为逮捕我方‘潜

伏分子’。最易引起敌特注意的，首为日记、文件。我为顾全整体，避免因小失大，就此忍痛暂告中止，让我这一直伴在身边的好友再度埋伏，我坚信我们再见的日子将不太远。”（这儿的“老友”指日记）

父亲对迎接胜利充满信心，然而不幸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被捕了。实际上，父亲很早就已经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旦被捕后所应采取的态度：“万一不幸，亦须换得适当的代价，既为了爱惜新生命，就得构成历史上的有利环境，帮助他永生下去。死，对我已经是不足为惧的东西。”对父亲来说，早已下定了为人民奉献生命的决心。

在狱中，父亲践行了他的决心和意志，在酷刑折磨下咬紧牙关，始终没有供出其他同志，坚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他亲手建立的地下情报网。敌人一无所获，最终恼羞成怒，于1949年5月21日上海解放前夕杀害了父亲。

我是读着父亲的日记长大的，他告诉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也成了我人生的一把标尺和指南。父亲离家（苏北解放区）奔赴敌后时，我刚三岁，他牺牲时我才五岁，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只是一个模糊而又陌生的“概念”，是父亲的日记使我走近了父亲，了解了父亲，聆听到他的教诲，走上继承他未竟事业的道路，成为了和他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对父亲日记的理解也越加深刻。特别是后来，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冲击，在那些倍感委屈和挫折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父亲在日记中表达出的坚强和对信念的执着，鼓励和支持我正确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抱怨不泄气，做好自己应做的每一件事。父亲能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我遭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父亲是光荣的，作为一名烈士的后代，这份光荣更多的是对他事业继承的义务和责任。父亲英勇牺牲的事迹，时刻约束着我的行动和思想，决不能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业和父亲荣誉的事情。

日记中的年代已远离我们而去，壮烈残酷的斗争，亲人牺牲的痛苦，也多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但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幸福的今天、美好的未来都是那个年代孕育出来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